

论四库馆臣对浦起龙《读杜心解》之评价

张 月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是清代杜诗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著作,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被列入存目之书,并遭到了严厉的贬斥。细察之,可将四库馆臣对浦氏之书的评语分为书籍卷数、编排体例、文附诗后、注解诠释、同乖体例等五大层面,并分别对其进行考察,辨别评价中的得当与谬误,有助于还原该书的真实面目,廓清前人对该书的误解,客观看待四库馆臣的评价。

关键词: 浦起龙; 读杜心解; 考辨; 分类; 编排; 注解; 廓清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1-0097-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16

The Research of the General Index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s Evaluation of Puqilong's *Koan of DuFu's Poems*

ZHANG Yue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Pu Qilong's *Koan of DuFu's Poems* is a considerable work in DuFu's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it was included in *The General Index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and was severely depreciated. In detail, the comments from the officers in the book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major levels: book volumes, arrangement styles, the essays following the poems, interpretations, violations against the styles. The textual research to the comments is helpful to the truth of the book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isunderstandings to the book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comments fro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rs.

Key words: Pu qilong; Koan of DuFu's Poems; textual research; classification; arrangement; annotation; clarification

《四库全书》是清代编成的一部包罗宏富的大型丛书,其中,杜集的书目较多,名家辈出。清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在诸多杜集中十分独特,成就斐然。放在乾嘉时期浓重的考据之风中,《读杜心解》显出其别样的意义和价值。^[1]但是《四库全书》不仅将其列入存目当中,还在《提要》中贬意甚重地进行批评。这无疑是让人费解的,故有必要对《读杜心解》一书的提要进行细致爬疏,仔细辨别与考证四库馆臣评价中的得当与谬误。唯有如此,才有助于还原该书的真实面貌与价值,廓清人们对该书的误解,构建更加完整的杜诗学。

首先来看《四库提要》中的《读杜心解》,全文如下:

通行本。国朝浦起龙撰。起龙有《史通通释》,已著录。其书虽总题六卷,而卷首分上下二册,不入卷数,卷一分子卷六,卷二分子卷三,卷三分子卷六,卷四分子卷二,卷五分子卷五,卷六分子卷二,实二十六卷也。自昔注杜诗者,或分体,或编年。起龙是编,则于分体之中,又各自编年,殊为琐碎。如《江头五咏》,以二首编入五言古诗、三首编入五言律诗,尤割裂失伦。其赋及杂文,旧本皆系卷末,起龙亦散附各诗之后,如《杂述》

收稿日期: 2018-09-20

作者简介: 张月 (1993—), 女, 陕西渭南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附《送孔巢父诗》后,《秋述》附《秋雨叹》后,《祭房琯文》附《别琯墓诗》后,《说旱》附《大雨诗》后,《封西岳赋》附《赠献纳使田舍人诗》后,事尚相属。以《三大礼赋》附《赠崔国辅于休烈诗》后,因诗中有“谬称三赋在”句;以《皇甫淑妃碑》附《宴郑驸马宅诗》后,因公主为淑妃所生;以《华州试进士策问》附《洗兵马》后,因所问乃中兴之政,已为牵合。至以《天狗赋》附《灵湫诗》后,以《雕赋》附《义鹘行》后,以《画太乙天尊图文》附《李道士松树障子歌》后,则强缀之甚矣。自有别集以来,无此编次法也。其间考订年月,印证时事,颇能正诸家之疏舛。而句下之注,漏略特甚。篇末之解。缴绕亦多。又诠释之中。每参以评语,近於点论时文,弥为杂糅。与所撰《史通通释》评与注释夹杂成文者同一有乖体例。殆好学深思之士而不善用所长者欤?

从该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四库提要》的撰写体例,一般而言,其包括作者简介、著录及版本、成书过程、内容评述、价值局限等若干方面。经过分析和归类,上述提要主要评价了如下方面:一、书籍卷数问题;二、分体之中各自编年;三、赋及杂文附诗后;四、句下之注漏略、篇末之解缴绕、诠释参评语杂糅;五、与《史通通释》同乖体例。本文就这五个方面进行层层剖析和考证,以期有所厘清。

一、书籍卷数问题

《四库提要》中指出《读杜心解》全书虽然总体分为六卷,但实际上每卷下又有细分,加之卷首的上下册,总共是二十六卷。但中华书局1961年版《读杜心解》并未分卷首的上下二册,统计总卷数为二十四卷。在书前的《点校说明》一文中也并未对这一改动有所说明。还有学者在论文中也明确指出,《读杜心解》全文二十四卷。^[2]查看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清雍正二年至三年浦氏宁我斋刻本^[3],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在卷首部分分为上册和下册,上册内容包

括《题辞》《发凡》《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本传》《元微之撰墓系铭》。下册内容包括《杜氏世系表略》《少陵编年谱书目谱》和《读杜提纲》。通过考证,可以发现四库馆臣的严谨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编排体例

四库馆臣指出的第二个问题即是“自昔注杜诗者,或分体,或编年。起龙是编,则于分体之中,又各自编年,殊为琐碎。如《江头五咏》,以二首编入五言古诗、三首编入五言律诗,尤割裂失伦。”历代的杜诗研究著作,正如四库馆臣所评,有专门研究杜诗某一种体例的分体著作,如《杜工部无言排律诗句解》。有以编年为主的,如《杜工部年谱》。但是,浦起龙选择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寓编年于分体之中”的编撰体例将编年和分体相结合,招致四库馆臣的非议。

诚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发凡》中说:“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杜集的编纂方式有自己的理解,以及对单独编年体或分门别类的杜诗著作不甚认可。所以,他将编年和分体进行了糅合,为了避免割裂,在卷首列出《杜诗编年诗目谱》,方便初学者厘清脉络,不致混乱。综合来看,浦起龙的尝试很有创新性,虽然这种编纂方式并非他个人首创,但是“直至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杜诗全注本的出现,才将‘寓编年于分体之中’的编纂体例发挥到极致。”^[4]

需要指出的是,四库馆臣的评价是带有保守观念桎梏的,并且贬词辞过多,对于超出传统之外的尝试持摒弃态度。纯粹的编年体或分体式的编纂方式也并非无懈可击,浦起龙的这种尝试,虽然也有其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四库馆臣认为浦氏该书“殊为琐碎”,并举例《江头五咏》中两首编入五古,三首编入五律。通观全书,浦氏将组诗中的不同篇目划归到不同分类之下实属常见,详情见表1。

表1 浦起龙《读杜心解》组诗划分不同诗体

| 组诗名 | 五古 | 五律 | 五排 | 七古 | 七律 |
|---------|----------|--------------------------|----------|----|------------|
| 江头五咏 | 丁香 丽春 | 栀子 鸂鶒 花鸭 | | | |
| 屏迹三首 | “衰颜甘屏迹”首 | “用拙存吾道”首 “晚起家何事” 首 | | | |
| 题张氏隐居二首 | | “之子时相见”首 | | | “青山无伴独相求”首 |
| 滕王亭子二首 | | “寂寞春山路”首 | | | “君王台榭枕巴山”首 |
| 玉台观二首 | | “浩劫因王造”首 | | | “中天积翠玉台遥”首 |
| 九日五首 | | “旧日重阳日”首 “旧与苏司业”首 | “故里樊川菊”首 | | “重阳独酌杯中酒”首 |
| 人日二首 | | “元日到人日”首 | | | “此日此诗人共得”首 |

由上看出，把同一组诗里的不同篇目列入不同分体之中，十分破碎和割裂，对于理解整组诗的内在意蕴并无多大帮助。浦起龙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在《少陵编年诗目谱》中按照编年次序将所有诗依次列出，并标明其所在页数。这样，无疑大大弥补了割裂的缺点，不仅让分体之作得以归类，也让整体组诗列入编年之中的心境动机得以彰显，两全其美。梁章钜在《退庵随笔》卷二十一称赞“其寓编年于分体之亦颇便检索”。^[5]洪业《杜诗引得序》则云：“起龙书中注解评论，与钱、朱、卢、仇辈立异之处甚多，虽未必处处的确可依，要是熟于考证者心得之作，未可嫌其编次体例之怪，而遽轻其。”堪为公允之论。^[6]反过来看四库馆臣的评语“殊为琐碎”“尤割裂失伦”则未免过于苛责。

三、文附诗后

对于浦起龙将杂文、赋等文章置于诗末，四库馆臣大书特书，并分为三层进行论述。第一层是“事尚相属”，第二层较第一层更进一步，“已为牵和”，第三层程度最深，“强缀之甚矣”，并说“自有别集以来，无此编法也。”对浦起龙的这种编法大为不满。

（一）事尚相属

关于“事尚相属”类的文章编排，四库馆臣

持认同态度，主要有《送孔巢父诗》后附《杂述》，《秋雨叹》后附《秋述》，《别房琯诗》后附《祭房琯文》，《大雨诗》附《说旱》，《赠献纳使田舍人诗》后附《封西岳赋》。《四库提要》的叙述中举出“事尚相属”的例子共涉及五首杜诗和五篇杜文，以下详述之。

《送孔巢父诗》全名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是杜甫即席为孔巢父所作的一首送别诗，兼呈李白，是表达自己对李白的挂念，要孔巢父见到李白时代为问候。此诗大致作于天宝五年到十三年（746年至754年）之间。诗中表达了对孔巢父名为辞官实为归隐的支持，意境缥缈，极具浪漫色彩，诗中哲理超然脱俗。附于诗后的《杂述》一文，也提及自己对孔巢父的赞叹和欣赏，流露对重逢的期待。文章开头就赞美张淑清和孔巢父是两位才士，并且“聪明深查，博辩宏大”。于文末再次赞美孔巢父的高尚人格，“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崢嶸以高，泗水潏潏弥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7]何时才能相会于王镐之京，一起饮酒，一起称兄道弟呢？由此可推断出，此文写于孔巢父离京之后。诗和文叙述的均为同一主体，二者的搭配组合，更有助于理解杜甫和孔巢父的交际和友谊，将文附于诗后十分妥帖。

《秋雨叹》是组诗，当作于天宝十三年（754

年)。由于连下六十多天的大雨给老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房屋青塌,禾稼无收,杜甫遂作此诗。其一假物(决明)寓意,叹自己之老大无成;其二实写久雨,叹灾民生活之困苦;其三伤穷困潦倒,兼叹民困难苏,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之感。三首俱以真朴见长,语虽委婉,而语语有分量。^[8]诗后所附《秋述》一文,作于天宝十载。主要讲述杜甫在病居长安时期的惨状,运笔具有世态炎凉之感。虽是秋雨时所作,但仔细品味,此文与《秋雨叹》并无关联之处。主要不同之处主要有三:其一,《秋雨叹》组诗三首均为描写秋雨绵绵所造成的灾害,对于秋景的描写篇幅非常多,如“雨中百草秋烂死”“阑风长雨秋纷纷”“去马来牛不复辨”“雨声飏飏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等,而《秋述》全篇对于秋的描述极少,仅一笔带过“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其二,《秋雨叹》三首所主要表达的思想是对人民所遭受灾难的同情和自己穷愁潦倒的窘境。但是《秋述》中并无对普罗大众的同情,大量篇幅描述的是门庭冷落的牢骚,和怀才不遇的愤懑,笔调悲凉,人情冷暖跃然纸上。其三,《秋雨叹》提及人物除了涉及杜甫和其家人之外,还包括众多的黎民百姓,并无明确的实指。但是《秋述》中是杜甫叙述和魏子的交情,作者笔意深婉,写我即写魏,写魏更即写我,具有明显的人物特指。由上看出《秋雨叹》组诗和《秋述》虽题带有“秋”字,实并无多大关联。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发凡》中曾曰:“今按诸篇于集中诗多有关会者,亦用附载酬唱诗例,分隶诗篇之后,各以类从。”合观《秋雨叹》与《秋述》,一无关会,二非酬唱,不知浦氏为何附于诗后,令人费解。

提要中《别房琯诗》在《读杜心解》中实名为《别房太尉墓》,是杜甫在广德二年(764年)赴成都只爱按在阆州祭房琯墓时所作,整首诗哀伤悱恻。既是哀悼房琯也是对自己流离漂泊的倾诉,深情满满,不胜凄楚,委婉含蓄。附载诗后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房琯遭谗罢相表示了深深的愤慨,“高义沉埋,赤心荡析。贬官厌路,谗口到骨。”并对自己的疏救未成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对房琯的死表达了深切的哀悼,这和诗中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沉痛感情,只不过在文中叙述地

更细致,表达的情感更加激烈。《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附于《别房太尉墓》后,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对房琯的感情,更深入地了解房琯被贬的来龙去脉,有助于阅者深入理解,故此处诗文相附非常贴合。

《大雨》作于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叙述久旱而始有雨,初夏的大雨冲刷着遍地的野草,诗人充满久旱逢甘霖的喜悦,哪怕自家屋顶漏雨也顾不上。大雨洗涤着城邑,人们神清气爽,禾苗复苏,污秽扫除,一片欢庆的美好景象。附在诗后的《说旱》是杜甫在宝应元年(762年)写给严武的。这是一篇鞭挞暴虐统治的论说文,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认为天降旱灾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对囚徒的虐待导致民怨沸腾。建议“除和死者之外,下笔尽放”,才可以天降大雨。整篇文章言辞恳切,富有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说旱》一文附于诗后,第一是二者时间上关联性较大。第二是通过诗与文的结合可以洞悉杜甫的自然观以及政治观。附于诗后的文更具有深刻性,能深入表现旱雨灾害背后的人生关怀和政治敏感。故将《说旱》附于《大雨》亦未尝不可。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当作于天宝十三年(754年),是杜甫赠给献纳使兼起居舍人田澄的一首诗。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对方的汲引,以求谋得重用。诗中“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自申己有像杨雄《河东赋》一样的好文章,只等着对方的引荐。整首诗语言精雕细琢,言辞恳切,不卑不亢。附在诗后的有两篇文章,其一为《进封西岳赋表》,其二为《封西岳赋并序》。两篇文章的大意是建议皇帝封祭西岳,并预想了封祭时候的宏大场面,咏叹历史盛衰变化。“在文中杜甫虽作出一副折腰乞怜状,但却以英雄自居,暗示天子不要使明珠暗投,良驹役犁天,天子憾遗股肱之臣,国家徒失栋梁之材。”^[9]可以说,诗与文均有杜甫的陈情和请求,蕴含着求仕的急迫和年华流逝的焦虑。所以将二者放在一起并不违和,四库馆臣所评极是。

(二) 已为牵和

关于“已为牵和”类的文章编排,四库馆臣持保留态度,并不是十分认可。主要有《赠崔国

辅于休烈诗》后附《三大礼赋》，《宴郑驸马宅诗》后附《皇甫淑妃碑》，《洗兵马》后附《华州试进士策问》。《四库提要》的叙述中举出“已为牵和”的例子共涉及三首杜诗和三篇杜文。

《四库提要》中的《赠崔国辅于休烈诗》在《读杜心解》中全名为《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当时天宝十一年（752年）所作。全诗可以窥见杜甫从献赋到召试不爽的全过程，表现了儒术在当时受到的冷遇。附于诗后的《进三大礼赋表》。《三大礼赋》主要是指《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杜甫在天宝九年（750年）投《三大礼赋》期望得到任用，全文首先回顾自己早年的经历，叙述当前的困窘。其次再委婉表明自己处境艰难但是不愿被埋没的苦衷。杜甫这次献赋，赢得了玄宗的重视，并且召试文章。从内容来看，二者时间上有先有后，并无直接联系。正如四库馆臣评价“因诗中有‘谬称三赋在’句”，故将《三大礼赋》附于诗后，有点牵强。

《宴郑驸马宅诗》在《读杜心解》中全名为《郑驸马宅宴洞中》，当是杜甫在天宝五年（746年）所作，全诗晶莹剔透，朦胧婉约，最后一句“自是秦楼压郑谷”，以秦穆公之女和郑谷来暗示公主和驸马二人。附于诗后的《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全文即是唐玄宗德仪皇甫氏的神道碑。皇甫氏是郑驸马的岳母，郑驸马的叔叔是杜甫的好朋友。从整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主要叙述了皇甫氏的家庭背景、生命历程、去世及埋葬、子女情况等。但是该文与诗歌并无丝毫关系，试想一个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宴会与皇甫氏的神道碑会有什么关系？仅仅是因为皇甫氏是郑驸马的岳母吗？着实颇费思索。

《洗兵马》一诗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杜甫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胜利的渴望，及早抚平战争伤痛的渴望，同时又不失讽刺，对一些时政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讥讽。后附有《华州试进士策问》，在《读杜心解》中叫做《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是杜甫代郭使君拟定的五条考试策问，涉及如何解决赋税、驿马供应、水陆交通、军队给养、币制改革等问题。^[10]该文体现了杜甫关心时事，时刻关注老百姓生活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洗兵

马》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同是反映杜甫对于时政的，可以体现出杜甫的额家国关怀，将二者放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并不牵和。

（三）强缀之甚

关于“强缀之甚”类的文章编排，四库馆臣最不能容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主要有《灵湫诗》后附《天狗赋》，《义鹘行》后附《雕赋》，《李道士松树障子歌》后附《画太乙天尊图文》，《四库提要》的叙述中举出“已为牵和”的例子共涉及三首杜诗和三篇杜文。

《灵湫诗》全名《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是杜甫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去奉先经过灵湫时作的一首诗。全诗描摹了灵湫的汤泉氤氲，玄宗幸温泉的浩大场面。篇中带有隐喻，其中蛤蟆化为长虬，似已暗示安禄山逆反之心已萌。《杜臆》云：“题主汤东之灵湫，非咏汤泉也。故篇中详叙湫之改移，与龙之灵怪，而汤泉只阴火数语，以引起灵湫。”^[11]附在诗后的《天狗赋并序》，首先二者在时间上是同时期的。“天宝间截至十四载，玄宗于每年十月幸华清宫，故推测杜甫能随从并参观天狗院”。^[12]另外在内容上，诗与文两者都暗示了安禄山叛乱之事，带有深切的殷忧。安禄山在这一时期势力强大，杜甫只能用隐喻的手法点醒，以求能够传达给皇帝。为了让人们发觉天狗即是安禄山，杜甫在诗中多次提醒，首先是指出它的产地，“昔西域之远致”；其次是指出天狗的豢者即是“胡人”；最后还是强调“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13]还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这只天狗不会“宁久被斯人终日驯狎已”，一旦“铁柱欹而金锁断兮”，就会“事未可就”。由此可以得出，浦起龙将《天狗赋并序》附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四库馆臣所言“强缀之甚”，风马牛不相及。

《义鹘行》是一篇歌行体诗，也是一篇寓言诗，讲述杜甫在江边听樵夫讲的鹘杀白蛇为苍鹰报仇的故事，诗中情绪激亢，为义鹘的义举击节称赞，“斗上捩孤影，噉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坼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惩恶扬善，篇末激发更多的义士的义举义行，极具煽动性。附在诗后的有两篇，

一是《进雕赋表》，二是《雕赋》，前者是为后者所作的表章。在《进雕赋表》中，杜甫先历数前辈的功勋，为了引起皇帝的欣赏。再叙述自己的文学天赋和积淀。继而自陈家世潦倒，乞求获得皇帝的重用。篇末以雕自比，再次陈述献赋求进之意，言辞诚恳，颇具巧心。《雕赋》以勇猛的雕寄望于立朝之大臣，其实是自喻。雕胜过任何鹰隼，是其他的凡鸟无法匹敌的。这篇文章描写了坚毅勇猛具有英雄之姿的雕鸟，既是写物，也是写诗人自己。整篇文章文采斐然，骈四俪六，富有美感。仇兆鳌评曰：“公三上赋而朝廷不用，故复托雕鸟以寄意。其一种慷慨激昂之气，虽百折而不回。全篇俱属比喻，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三复遗文，亦当横秋气而厉风霜矣。”^[14]诗和文虽然同样都在写巨型猛禽，但是细察之后，二者有如下异同：其一，《义鹘行》是杜甫于江边听说的一个故事，全诗慷慨激昂，酣畅淋漓，富有感染力。而文《进雕赋表》和《雕赋》虽然是写雕，但是故事性不强，象征和比喻都有政治求仕之意，有含蓄内敛的恭敬之态。其二，《义鹘行》的写作背景是杜甫在被谗遭排挤所作，故含有更多的悲愤和不满，借义鹘之举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寄希望于将来的义士。但是《进雕赋表》和《雕赋》的写作背景是杜甫在穷困潦倒之时不忘仕进，希望通过写雕引起统治者重视，并企求提拔和重用，字里行间带有心谨慎和渴望提拔的迫切之情。总体看来，诗与文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四库馆臣认为“强缀之甚”，也是有几分允当。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是杜甫写的一首题画诗，杜甫称赞李尊师的画作“凭轩忽若无丹青，阴崖却承霜雪干，”意境悠远迷蒙，让人向往。又称赞画中的人物像商山四皓一样，“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诗末回到悲伤中，此时国家正处在危难之际，民生凋敝，战乱搅扰，此时似从松林中飘出哀风，让人惆怅不已。附在诗后的《画太乙天尊图文》全名为《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此文首先叙述仙阁的景象，接着以道士弟子之口吻张扬柳涉，最后假托石鳌先生之口发表杜甫对时局的看法。石鳌先生针对当时混乱的时局发表了看法，首先叙述从古到今的致乱之由，接着论述只要众生信奉道教教义，就一

定会国泰民安。由此可见，杜甫的儒道混合的复杂思想。诗和文的关系不大，主要体现在：其一，《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全诗用大量的篇幅写画中之景，而《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全文却将大量笔墨用在描述道家仙阁；其二，《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诗末关怀时局，诗人囿于困境但却未有良策，诗中充斥着挥之不去的忧伤，发人深省。《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虽也论及当时混乱时局，但是所给出的药方为信奉道教教义，无疑是对当时时局于事无补的。其三，《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虽是点评道士之画，但是全诗并无太多对道家道士所居环境及仪度的渲染，故整首诗具有悠远缥缈的意境，但并无任何宗教色彩。《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中对道家道士场所的描述，对道教教义的弘扬与倡导，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此看来，四库馆臣评“强缀之甚”，也不置可否。

四、注解诠释

四库馆臣论述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注解的问题。他们认为“而句下之注，漏略特甚。篇末之解。缴绕亦多。又诠释之中。每参以评语，近於点论时文，弥为杂糅。”在1961年中华书局版本的《读杜心解》的《点校说明》中，提到该书中的注中疏略之处颇多，将《史记索隐》误作《汉书索隐》，引用宋玉的《讽赋》误作《风赋》，等等。

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的注解，除了错讹之处之外，还有一种缺陷就是注而不明。比如《九日寄岑参》中的“寸步曲江头”，其注曰：“曲江在杜陵西北”，对于熟悉长安地理的人来说非常易懂，但是对于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来说，这种注释无疑更让人迷惑。另外还有“旷原延冥搜”，注曰“《穆天子传》：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注解中所引用的典故和要解释的词语并无多大关联，实际上属于注而非注。

篇末之解，四库馆臣评曰“缴绕亦多”。对于篇末的注解，并非四库馆臣评价的一无是处。虽然也有某些诠释不甚允当，比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篇末：“恐所云‘秦山破碎’‘不辨皇州’，及‘虞舜’‘云愁’‘瑶池’‘日晏’等语，比于

无病呻吟”。说杜甫该诗中的一些词语无病呻吟。但是很多注解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比如《石壕吏》篇末的额注解“仇注谓孟县，非。孟县在河之北，不当云河阳。且尚在河北，不须断桥矣。”对于自己不明确的事物，不会贸下定论，非常谨慎小心。比如《遣兴二首》篇末“二诗不知何指，不敢强为之说。朱氏以龙拟安、史，以马喻李、郭，恐亦未安。”

“诠释之中，参以评语”，是四库馆臣对浦起龙以时文解诗的不满。用八股的格式化方法点评杜诗，有点机械和穿凿。比如《后出塞五首》评“五诗如《前出塞》，逐层下。但交河之役，其情苦，故叙别家在路特详。蓟门之役，其气豪，故叙跋涉行程较略。又河陇之开边，其祸尤缓，故徐入后，以遏人主喜功之心。渔阳之促叛，其祸已迫，故恳切具陈，以明即日见凶锋之炽。忧愈急，词愈危，有祖伊奔告之苦衷焉。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起四句，作冒头。‘召募’四句，点事生色。‘闾里’至末，以旁笔衬行色。就中又分出老少两层，加意挑剔。结语肉飞眉舞，恰与‘及壮封侯’对照。”

五、同乖体例

四库馆臣认为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与《史通通释》评与注释夹杂成文有乖体例，并讽刺浦起龙虽好学深思，但并没有发挥所长。有学者曾撰文写道：“全书引据详明，考定精审，惟轻于改窜，往往失其本旨……至于句解章评，参差连写，如坊刻古文之式，有乖注书体例，尤为通人所讥。”^[15]在《史通通释》的内篇《六家第一》中，浦起龙评曰：“至隋而又有王劭隋书，亦是后来记言者一家。上二家以类附，以下则就二家衡论。”将注解和评论杂糅在一起，殊为难解。这样的例子在蒲氏的《读杜心解》中也有不少，《送殿中杨监

赴蜀见相公》诗后云：“首段兴起别意。中幅言杜必急得子，……‘山门’，谓夔峡，即己身所居者。‘思’，思其莅职设施之事，是则杨监所‘当念’也。别情亦在内。”将段落的诠释和字词的解釋肉仔一处，着实杂乱。四库馆臣所评，并非虚言。

【参考文献】

- [1] 吴中胜. 心哉美矣：《读杜心解》的感悟式批评[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60-62.
- [2] 孙微. 清代杜诗学文献考[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74.
- [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八册[M]. 山东：齐鲁书社，1997：517.
- [4] 张寒. 浦起龙《读杜心解》研究[D]. 保定：河北大学，2010.
- [5] 梁章钜. 退庵随笔[M]//郭绍虞，编. 清诗话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76.
- [6] 孙微. 清代杜诗学史[M]. 山东：齐鲁书社，2004：159.
- [7] 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61：222.
- [8] 卢国琛. 杜甫诗醇[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14.
- [9] 慧绘. 杜甫的三次陈情及政治抱负[J]. 文史杂志，2014（4）：43.
- [10] 卜进善. 杜甫在陇右（上）[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15.
- [11] 王嗣奭. 杜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0.
- [12] 石林.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528.
- [13] 何香久. 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隋唐五代卷[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300.
- [14] 杜甫. 杜诗详注[M]. 仇兆鳌，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63.
- [15] 张新民. 《史通》评释诸本述略[J]. 文献，1988（2）：114.